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通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20年4月刊·第4期(总第43期)

本期要目

■ 思想前沿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于4月28日生效

■ “大系”平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总序

■ 学术视野

破解神话传说中的历史密码

民间文献、数据库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

■ 文化实践

众志成城，共同战“疫”——各地民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综述（三）

目 录

■ 思想前沿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1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于 4 月 28 日生效.....4

■ “大系”平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总序.....5

· 各地推进动态 ·

四川启动《大系》2020 年编纂工作..... 10

通堵点,攻难点——“驻马店故事卷”狠抓进度不松劲..... 12

■ 学术视野

破解神话传说中的历史密码(段勇).....13

从鸽谚看民间谚语的价值(张丹).....17

· 论文推介 ·

民间文献、数据库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黄向春)..... 21

古代小说经典的民间重构——清代车王府鼓词《西游记》论略(纪德君)..... 24

节日传说、民间信仰与地方史的互动研究——以绕三灵传说为研究中心(张翠霞)..... 28

■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众志成城,共同战“疫”——各地民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综述(三)..... 31

主 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理论研究处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编辑部主任

王锦强

编辑人员

覃奕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 32 号楼 B305

投稿邮箱

mjwydt2016@163.com

电 话

010-59759239

010-59759490

本期印刷:2020 年 5 月

河南开封将清明文化节搬上“云”端..... 32

· 国际信息 ·

澳洲民众线上“云”游中国世遗..... 3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征集 COVID-19 流行背景下的活态遗产经验..... 35

思想前沿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旅游报社：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 6 月 13 日。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非遗保护良好社会氛围，文化和旅游部决定在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集中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聚焦非遗在人民大众健康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宣传非遗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网络平台开展为主，重点围绕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类非遗项目，开展非遗宣传传播等活动，普及非遗知识和健康生活理念，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二、主题、口号与重点

（一）主题

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

（二）口号

1. 非遗传承进万家 健康生活你我他
2. 非遗代代传 健康常相伴

3. 传承文化瑰宝 守护自然之家

(三) 工作重点

1. 结合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非遗相关知识，倡导非遗融入生活、服务社会。

2. 围绕列入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类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宣传展示近年来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和优秀实践案例，交流保护经验和保护措施。

3. 深入挖掘非遗在促进人民大众身心健康方面的典型案例和生动事迹，宣传非遗在疫情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策划举办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类非遗知识网络讲座、讲坛、培训活动等。

4. 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文化风格和资源特点，将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以当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展示活动。

三、活动安排

(一) 主会场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将发动网络视频平台联合举办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全国主会场活动——“2020 非遗影像展”，集中展播各类优秀非遗资源，让更多社会公众关注、了解生活中丰富多彩的非遗和生动的非遗保护实践，激发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实践的浓厚氛围。

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按照厉行节俭、务实而又不失热烈的原则，确定本省（区、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 各地开展活动

各地要结合本地非遗资源特点，以网上宣传传播活动为主，增强宣传展示活动的互动性、参与性，提高人民群众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参与感、获得感。要主动沟通体育、中医药等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高等院校、餐饮协会等，积极联合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鼓励支持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类非遗学术研究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参加参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线下活动要严格服从当地疫情管控的各项要求和规范。

（三）各相关直属单位开展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各相关直属单位，要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开展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筹备。要按照中央和各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要求，组织开展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要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展和中央关于复工复产通知的有关要求，因地制宜、分区分级，统筹安排本地区各级各类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二）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要紧扣“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主题，在主题框架下策划部署相关活动，突出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类非遗项目的重点活动。及时发布“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活动信息，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提高各类活动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丰富活动形式，利用新媒体载体和网络平台，策划组织线上宣传传播活动。

（三）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把活动内容和价值导向，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各项活动要有安全研判，落实安全责任。做好疫情管控、消防、医疗救助、应急救援等工作预案，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和安全检查设备，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请于2020年5月10日前将本地区、本单位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信息汇总表（格式见附件）报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我部将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遴选的重点活动信息，向媒体发布。

请于6月20日前将本地区、本单位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总结（包括活动情况、参与人次、亮点和经验等）报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联系人：张呈鸿、闫燕

联系电话：010—59881369 59881368

电子邮箱：fyscbc@mct.gov.cn

特此通知。

附件：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信息汇总表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0 年 4 月 22 日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2020 年 4 月 23 日）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于 4 月 28 日生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我国缔结、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简称《北京条约》）已于 4 月 28 日生效。

据了解，《北京条约》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北京缔结，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一项旨在保护表演者权利的国际版权条约。《北京条约》针对录制在“视听录制品”中的表演，为表演者规定了广泛的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提供权。表演者对其未录制的表演，拥有广播权、向公众传播权、录制权。条约填补了视听表演领域全面版权保护国际条约的空白，平衡了创作者、制片人、表演者等各环节的利益关系。根据条约生效条款，其将在 30 个成员国批准、加入 3 个月后生效。今年 1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成为该条约关键的第 30 名成员，这一国际版权条约得以在 4 月 28 日生效。

据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条约》的缔结和生效，将全面提升国际社会对表演者权利保护的水平，从而充分保障视听表演者的权利，进一步激发其创作热情，丰富精神文化产品，推动视听产业健康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艺，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高度赞扬《北京条约》，称其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月 23 日，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2019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目前，《北京条约》批准或加入的国家已达 31 个。于慈珂表示，国家版权局将继续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积极推动更多的国家批准、加入《北京条约》，也将以《北京条约》的生效为契机，不断完善版权保护体系，推动包括视听表演在内的版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北京条约》将给我国《著作权法》修订带来的影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版权和法律事务室主任郑直表示，《北京条约》所创设和规定的各项权利，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为表演者设定的各项权利基本吻合。我国只需要在修法时为表演者增加“出租权”，即可满足条约的相关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在“类电作品”中，演员表演的权利已被“类电作品”吸收，由制片者统一行使。这一安排是符合行业实践的，有利于提高交易和传播的效率。而在录像制品中，表演者的权利则得以保留。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原题为“《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 填补视听表演领域全面版权保护国际条约空白”，2020年4月29日）

“大系”平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总序

5000 多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镌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传统智慧，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之源，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中立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追溯中华文化的源流、探究中华文化的传统、前瞻中华文化的走向，对于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立根铸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心聚力，具有重大意义。

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2017年1月，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编纂出版《大系》列为其中的重大工程。《意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对传承发

展工程的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等作出了重要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遵循。民间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基础资源之一，它鲜明而又直接地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审美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由中国文联负责组织实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中国民间文学遗产抢救保护与传承的民心工程。这一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以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收集整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及理论方面的原创文献，编纂出版《大系》大型文库，完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为中华民族保留珍贵鲜活的民间文化记忆。在编纂同时，开展一系列以中国民间文学为主题的社会宣传活动，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的发掘、传播、保护，形成全社会热爱、传承优秀传统民间文学的热潮，形成德在民间、艺在民间、文在民间的共识，推动民间文学知识普及与对外交流传播。

民间文学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具有与生俱来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因为民间文学活动本身就是人民的审美生活，是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样式，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众在表演和传播民间文学时，就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人民创作、人民传播和人民享受，是民间文学人民性的具体表现。

民间文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首先，民间文学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集体智慧的结晶，积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极为丰富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意识形态。其次，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学和学问，具有最为广泛的人民性，没有哪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拥有如此众多的作者和观众。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所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也是最为深刻和久远的。再次，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和熟悉的审美方式，也是最为便利的文学活动形式。每个地方都有祖辈延续下来的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小戏、说唱等等，为当地人耳熟能详。这些民间文学一旦进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便释放出强大的感化能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间文艺的传承保护。民间文学搜集抢救整理成果丰硕，为编纂出版《大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50年3月，我国民间文学、民间戏剧、

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等领域的艺术家与研究家发起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1987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实施中国民间文艺的传承与研究。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代表们讨论并通过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1979年9月，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在京召开，众多民间歌手和艺人恢复名誉，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工作也随之重启。1984年2月，中宣部印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同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民研会印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全国各地大批民间文艺专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们会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学术力量和社会力量，开始了民间文学抢救整理工作。1987年至2009年，在全国普查、采录的基础上，全国各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编辑出版。“三套集成”从酝酿、立项到全面实施，历经近30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重庆、港澳台）编纂出版90卷（102册），总计1亿多字，一大批珍贵的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成为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通用读本。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等工程又相继开展，取得扎实而宝贵的工作进展。为了进一步适应今后文化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阅读、研究与利用的实际需要，2010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实施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已陆续完成10多亿字民间口头文学记录文本的数字化存录，最终将形成体系完备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以有效避免因各种因素造成的纸质资料遗失和损坏，并使阅读、检索和利用这些作品及资料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和准确，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间文艺工作的实践与经验，数十亿字民间文艺资料的积累与储备，数十万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是我国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也为《大系》的编纂工作确立了综合实力和巨大优势。

大系出版工程是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保护、传承工作的扩充、延伸、深化、升华，更是民间文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大系》文库按照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说唱、小戏、谚语、谜语、俗语、理论12个门类进行编纂，计划到2025年出版大型文库1000卷，每卷100万字，共10亿字。该工程制订的长

期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分类别的运作策略和实施举措，保障了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科学化运用。

《大系》既是有史以来记录民间文学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种类最齐全、形式最多样、最具活态性的文库，也是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领域开展的新时代综合性成果总结、示范性的本土文化实践活动。它将几千年来在民间普遍传承的无形精神遗产变为有形的文化财富，从而避免在全球化语境下民间文学遭遇民众文化失语和传统经典样式失忆的尴尬与窘境，为世人了解中国民间文艺发展规律、应对社会转型和变革所带来的传统文化衰微之势，提供了文化复兴的有效良方和经验范式。

《大系》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理念，在选编标准上，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萃取经典，服务当代。各分卷编委会着力还原民间文学的本真形态，忠实保持各民族作品原文意蕴，在内容、形式、类型等方面力求反映出民族风格和当地口承文化传统特点，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四性”原则，在各类文本中，精心编纂出具有民间文化传统精神和当代人文意识的优秀作品文库。

编纂出版《大系》，我们始终坚持具有鲜明导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大系》汇集全国各地民间文艺领域上千名专家、学者，计划用8年的时间对民间文学12个门类进行搜集整理、编纂出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大系》既是党中央交给中国文联的一项重要文化建设任务，又是民间文艺界的一项重大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中华民族大型文化精品创建工程，又是一次中国民间文学主题实践宣传活动；既要深入田间地头调查搜集采录第一手资料，又要坐在书斋静下心来进行归纳整理研究。《大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性、专业性、群众性。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积极思考和探索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等时代命题，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关注民间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我们民族创造的民间文艺更接地气、更有底气、更具生气。

《大系》编纂出版工作确立了“三个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正确价值取向，对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制度风俗、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乡规家风等加以梳理和诠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民间文学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民间文学在“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是坚持广泛性和代表性相结合，在广泛普查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加强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精神与思想内涵的挖掘和阐发，把强调先进价值观与突出地域文化特色、民族风格密切结合起来，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和合一体的共同精神家园；三是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以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想为学术指导，加强民间文学各类别经典文本呈现、精品范本出版，促进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注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实现从口耳相传到多媒体传播的时代变化，激活其当代价值，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地打造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表达的经典传世精品。

编纂出版《大系》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积淀深厚，灿烂博大，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和基石。千百年来，我国民间文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鲜明地表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向往、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充分彰显着中国人的气质、智慧、灵气、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中华文化的亮丽瑰宝和鲜明标志，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但同时也要看到，民间文学又是脆弱的。随着转型期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城镇化带来的高速发展，民间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迅速流失，不少优秀民间文学正在成为绝唱，更多的民间文学资源业已消失。因此，抢救与保护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各区域、各民族现存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按照当代学术规范和学科准则，大规模开展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推广、研究，激发全社会对我国优秀民间文学的热爱和珍视之情，促进民间文学保护、传承与发展，延续中华文脉，造福人民大众，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供民间文学精致文本和精彩样式，已成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有

创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进一步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情感、表达形式，充分尊重一代又一代民间文艺创造者、传承者的经验智慧与劳动成果，进一步凝聚共识，精耕细作，落实好、完成好大系出版工程的各项工作，不断书写出中国民间文学新的辉煌，既是新时代赋予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更是我们共同担当的神圣使命。

我们郑重呼吁：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共同承担起抢救中华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神圣职责！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19年3月5日

（中国民协供稿）

· 各地推进动态 ·

四川启动《大系》2020年编纂工作

4月22日，四川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2020年编纂工作启动会在成都召开。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兵，中国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西南民大教授沙马拉毅，四川省民协主席孟燕和各卷主编、副主编及参加选编工作的编纂人员与会。会议通报了近两年四川省《大系》编纂任务的完成情况，明确了2020年四川编纂任务，并为《大系》四川各卷主编、副主编颁发了聘书。会议由四川省民协副主席、秘书长黄红军主持。

黄红军首先介绍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项目概况及近两年来四川省的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和四川省2020年的编纂任务。他说，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所列十五个项目之一，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实施，中国民协具体执行，是中国民协近年来的重点

工作，也是各省市自治区民协的重点工作。自 2018 年四川启动该项目以来，已完成了《大系·歌谣·四川卷·汉族分卷》《大系·歌谣·四川卷·民族分卷》《大系·史诗·四川卷·格萨尔分卷》《大系·故事·四川卷·汉族分卷》的编纂工作，其中《大系·歌谣·四川卷·汉族分卷》作为《大系》首批成果 12 卷示范卷之一已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出版发布，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根据大系出版工程 2020 年各省市自治区编纂任务要求，四川省今年共有 3 卷编纂任务，分别是：《大系·故事·四川卷·民族分卷》《大系·神话·四川卷》《大系·长诗·四川卷·苗族分卷》。此次会议旨在统一认识、明确任务、商议细节，确保编纂工作顺利推进。

会上《大系》四川故事民族分卷主编孟燕、四川神话卷主编周明、四川苗族长诗卷主编杨正文相继发言，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编纂团队，围绕资料准备、编纂体例、选编原则、注意事项发表了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指导性的看法意见，为下一步编纂工作的具体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沙马拉毅在会上对四川的《大系》编纂工作成绩表示肯定，他再次强调大系出版工程的重要性，希望各位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高度重视，不忘初心，再接再厉，把今年的三卷编成精品力作，早日完成。

李兵对四川省民协近两年来为完成《大系》四川卷的编纂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代表四川省文联党组给予肯定和赞赏，并提出三点希望：

一、要高度重视《大系》编纂工作。他说编纂出版《大系》是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的重要抓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民协承担的国家重大的文化工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重大意义集中体现在“五化”上：一是碎片文学整体化。将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文学形式收集整理，有利于展示民间艺术的整体形象。二是口头文学数字化。将各种口口相传而未作记载的民间文学通过调查录入形成文献，有利于对民间文学的信息查询。三是民间文学社会共享化。将分布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民间文学集中起来形成《大系》，有利于全社会共享民间艺术的精彩华章。四是地域文学结集化。将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学汇集成册，有利于结集呈现广袤中华大地上的民间艺术经典。五是民族文学系统化。将各民

族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编纂出版，有利于系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脉络，增强文化自信，映射中国精神中国梦。

二、要进一步明确《大系》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强调要努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重要遵循。因此，我们在编纂工作中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认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把《大系》编纂出版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确保编纂工作不走弯路。

三、倾心、倾情、倾力作好各卷本编纂工作。《大系》四川各分卷的编纂出版工作是一项工程浩繁且意义非凡的政治任务，各位专家学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在编纂过程中讲质量、讲效率、讲科学，全力完成好今年四川三卷的编纂任务，让四川卷在《大系》中出新出彩！

启动会后，各卷在主编的召集下分组进行沟通、交流和讨论，细分了具体的选编任务及时间安排，力争按时保质完成今年的编纂任务。

（转自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通堵点，攻难点—— “驻马店故事卷”狠抓进度不松劲

4月29日，驻马店市举办《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驻马店分卷》（以下简称“驻马店故事卷”）编纂工作推进会，邀请河南省民协顾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专家组组长乔台山对“驻马店故事卷”编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解疑释惑。

驻马店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韩祖和，驻马店市民协名誉主席刘康健、耿瑞，驻马店

市民协主席谭咏利与“驻马店故事卷”编纂专家组成员参加会议，并就编纂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澄清编纂工作中的模糊认识，进一步理清编纂思路，把握编纂时间进程。

驻马店市文联高度重视民间故事的编纂工作，专门成立编纂委员会。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2019年9月17日召开“驻马店故事卷”培训推进会，邀请中国政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主席程建军与乔台山组长现场讲课。编纂工作启动以来，虽然因疫情影响，进程比预期略微滞后，但整项工作进展顺利。

驻马店市文联主席韩祖和要求参与编纂工作的专家和学者要高度重视“驻马店故事卷”的编纂工作，按照省专家组提出的思路和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为驻马店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转变作出积极贡献。

（转自微信公众号：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学术视野

破解神话传说中的历史密码

段勇¹

神话传说时代应该是人类不同民族共有的时代，神话与传说交织是人类蒙昧时代的共同特征之一。神话反映一个民族在童年时代对世界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类似童话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

一、在中国，神权高于王权的情况不多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化共同体，在其文明化进程中，很长时期内似乎普遍都是神权高于王权，有的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和现代。

但是，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可能是一个比较早熟的民族，因而，

¹段勇，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党委副书记。文章转自《光明日报》2020年4月26日12版。

神权高于王权的情况不多。

从考古发现来看，只发现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瑶山、汇观山祭坛和反山高等级大墓出土的玉器上，普遍具有“神徽”形象，以及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祭坛和女神庙等，能够反映神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王权处于从属地位或与神权合二为一。

而在作为后来华夏文明核心地带的豫西、晋南、关中等中原地区，大致同时代而稍晚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却未能发现类似的神权至上现象。陶寺遗址大墓中虽有鼉鼓、特磬等作法礼器随葬，但尚难证明墓主是最高领袖。

夏朝作为中原主体王朝的开端，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二里头遗址中尚未发现能说明神权地位的明显遗迹。而到商朝时期，从甲骨文和考古发现可知，虽然其空前绝后的占卜、祭祀和殉葬制度能够证明，神权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祭司仍然是为商王服务的，或商王本身就是大祭司。到西周时期，神权彻底衰微，我国至此基本形成了相当理性的主体意识形态，神话之花早早凋零。这也符合《礼记》所载：“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二、中国的神话传说为何留存不多

先秦典籍中，《尚书》篇章内容大抵为三代君主对臣下的誓、命、训、诰之类，少有与神话相关内容。《诗经》中保留了一些与商族、周族始祖诞生等相关的神话传说，但与宗庙祭祀相关的“颂”总共也只有40篇，占全书305篇的很小部分。当然这也可能是经过孔子等儒家删订的结果。唯有《楚辞》中保留了较多瑰丽奇异的远古神话传说，特别是《九歌》《天问》等篇，而它代表的楚文化在汉以前并不属于华夏核心文化圈。

身为商族后裔却声言“吾从周”的孔子显然是个理性主义者。《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尤其是一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更是道破其并不相信“神在”的本心。孔子的态度直接确立了儒家对神话传说的消极立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在这极端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策中，最

严重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被处以最严厉的处罚：灭族。秦始皇时代的“古”无非是指夏商周三代及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而那正是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因此这条禁令堪称是当时官方神话文献和民间神话传说的“催命符”。好在秦祚不长、二世而亡，想必当时仍应残存着不少关于神话传说的民间记忆。

然而，秦汉之际的战乱平息不久，汉武帝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考量，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由此一举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正统思想，其间虽有佛、道等思想介入，但儒家的思想主体直到近代从未改变。该政策对形成中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维系国家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与“焚书”一样，都对神话传说赖以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

从此，神话在中国官方主流文化中的地位被彻底边缘化，众多神话湮没失传，少量借助民俗传承而苟延残喘。与之相应的宗教意识形态也一直发育不太成熟，源远流长的传统鬼神信仰（巫）亦仅局限于民间。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我国以汉族为主的现存神话体系是支离破碎的，缺少完整的“神族”谱系，而且广泛存在本土原生神话与外来传入神话混杂演变的现象，形成神话传说领域的“层垒造神”现象（即时代越晚对远古神话的描述越详细——编者注）。

三、残存的神话也隐含史实

虽然留存甚少，但是这些零星的神话传说，对探讨我们民族的童年意识甚至童年记忆仍具有重要价值。

克里特、迈锡尼、特洛伊等地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荷马史诗》等传承的诸多古希腊神话传说是与真实历史混杂、纠缠在一起的，如米诺斯迷宫、特洛伊战争等，仔细剥去其神话外衣，就裸露出历史的原形。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同样也是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古本《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等均有相关记述：古时（或直指尧时）曾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导致大地苦旱庄稼焦枯，善射英雄大羿（或言其为东夷首领“夷羿”）为解民困，挺身而出射落九个太阳，天下方复归常态。

由文献记载可知：三代时的夏族人是尊崇太阳的，以之为君王的象征。比如夏朝的亡

国之君夏后桀骄奢淫逸、暴虐无道，《尚书·汤誓》记载当时的民谣“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将夏桀比作酷烈的太阳。《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取夏而代之后，商王武乙尝“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射日”。夏亡以后，《史记·夏本纪》载“汤封夏之后后，至周封于杞也”，故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作为夏遗民的杞人，偏偏留下了“杞人忧天”的成语，恐怕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夏人尊崇太阳的传统理念，杞人所“忧”，大者应是亡国后的悲哀，小者也许只是连日阴雨不见太阳的焦虑，只不过被《列子》错误解读了。

据《史记·夏本纪》，夏朝建立不久刚传位至第二代，即发生了“太康失国”的重大事件，太康因荒嬉被逐，其弟“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羲和是帝俊之妻，生十日而居扶桑，每日轮流值日。“废时乱日”似与十日并出、后羿射日有关。《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之言：“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此即“后羿代夏”，而夏后仲康应是后羿的傀儡。后羿晚年因耽于田猎，重蹈太康覆辙，被部下寒浞杀害篡位，寒浞之子杀了仲康之子夏后相，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后在母族和友族支持下攻灭了寒浞父子，最终复位为夏后，史称“少康中兴”。在这近百年的剧烈动乱中，不仅夏后世系命悬一线，整个夏族也元气大伤。

关于夏代的考古学探索一直是个热点。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这里已发现了宫殿建筑群、贵族居住区、手工作坊群、中小墓葬群等遗址，是我国同时期最大的都邑。也有部分学者因尚未发现文字、不能直接证明其与夏代的关系而对其是否为夏代都城持谨慎态度。

历时4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于2000年发布了《阶段成果报告》，综合判定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而二里头遗址1—4期的碳14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另有公元前1750—前1520年之说），属于夏代中后期。

而且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有明显来自东夷的文化因素，比如其出土的鬻、觚、折盘豆、单耳杯、三足盘等陶器，不见于此前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同类陶器相似，应该是来源于后者。

因此，李伯谦先生很早就研究指出：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文化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他后来又进一步判定，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密县新砦期遗址，即是“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期间的物质遗存。

笔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读硕士研究生时始以三代青铜器纹饰为研究方向。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青铜器，限于当时铸造技术水平，大部分光素无纹，小部分只有弦纹和连珠纹两种装饰，因而特别珍稀。笔者当时大胆推测，夏代青铜器上的连珠纹应该是后来商代部分青铜器上象征火的“囧纹”（也有学者认为其是象征水的“圆涡纹”）的前身；夏代青铜器上连珠纹的数量虽然未必恰为十个，但有可能是“十日”（也许再加上帝俊、羲和）的象征。再进而联想到“羿射十日中其九日”的神话传说，推测该神话可能是在少康复国后的高压环境里，东夷族在“羲和生十日而轮流值日”的上古神话基础上加工而成，以此隐晦反映“后羿代夏”这段曲折史实，以传承本族历史、缅怀后羿功绩。秦以后东夷文化融入华夏主体文化并广为传播，“后羿射日”才逐渐失去隐喻，成为脱离史实的单纯神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然界的确存在“数日并出”的奇观，这其实是自然界的一种大气光学现象，气象学家称之为“幻日”现象。比如，2006 年 3 月 3 日在我国黑龙江大庆市就出现了“四日并出”现象，2013 年 11 月 1 日在内蒙古赤峰市又出现了“五日并出”现象。这说明古人的想象终究还是难以完全脱离现实的影子。

总之，神话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隐含历史或文化的密码，应该大力加强挖掘、搜集、整理与研究。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哪里去？”这是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都感兴趣的三大终极问题，也是从事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学者责无旁贷应该关注的课题。

从鸽谚看民间谚语的价值

张丹¹

赛鸽运动在国外，尤其在欧洲是一项十分盛行的民间体育运动，最为突出的是在世界

¹张丹，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换手文化科技”。

上公认的赛鸽王国比利时，不分贵贱，上至皇家贵族、博士教授，下到寻常百姓，均热衷于此。

奥林匹克鸽王赛是中国信鸽协会与国际鸽联接轨的一项赛事，也是世界奥林匹克赛鸽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赛鸽运动的国际化发展水平。赛鸽运动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20世纪20年代，我国就有自己的信鸽组织，也是亚洲最早的信鸽组织之一。如今，在中国信鸽协会统一领导下，每年均举办全国性信鸽竞翔和品评大赛。与之呼应的还有从国家到地方、直至个人均有相关的赛鸽杂志或报纸，以及赛鸽网站，形成了一个立体且流动的极具特色和旺盛生命力的民间群众体育运动。

在赛鸽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过程中，人们已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然科学对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诸如生物学、遗传学、医学、营养学、空气力学、气象学、地理学等等。

然而，人文科学的作用，则往往被人们忽视。且不说《圣经》里“诺亚方舟”上衔回一枝绿色橄榄的和平鸽，为人类再次着陆于地球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赢得人类的“三千宠爱于一身”；也不必说各种大型庆典活动中少不了信鸽那矫健的身影，组成其议程或开幕仪式的重要内容；更不必说在文学艺术殿堂里以鸽子为题材的作品为信鸽赢得了“有口皆碑”，在无数人的心田里烙下了美好的“神鸟”情结；单说民间文学里的“谚语”，就对赛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赛鸽运动丰富和发展了谚语宝库，尤其是其中的鸽谚；反之，谚语，尤其是其中的鸽谚，对赛鸽运动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这不难理解，民间文学和赛鸽运动均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的共同特征。

就赛鸽运动而言，它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尤其在我国，就如同武术、举重、摔跤、围棋、象棋等体育项目一样，是传统的体育项目，号称“信鸽王国”的比利时，也只有10万会员，而我国却超过30万，可见群众基础之广泛。而民间文学更是直接扎根于劳动人民生活土壤中的文学，它紧密地伴随着劳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地反映了现实，直接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愿望。它的艺术形式产生于广大群众，并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而且更为他们所掌握、所运用。其中，谚语是人民群众用精练的语句总结各种经验的语言艺术结晶，具有教育性、科学性和哲理性。

《说文解字》曰：“谚，传言也。”《国语·越语》韦昭注则曰：“谚，俗之善谣也。”鲁迅先生对谚语有过很高的评价，夸它为“意味深长的话”。高尔基则说：“最伟大的智慧是在语言的纯朴中，谚语和歌曲总是简短的，然而在它们里面却包涵着可以写出整部书来的智慧和感情。”我们把它称之为“语言中的盐”，可谓再形象不过了。我国谚语源远流长且极为丰富多彩，早在三千年以前殷代甲骨文中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易经》《诗经》《左传》《列子》等古籍以及少数民族古老的史诗中，均保存和引用了许多古代人民的谚语。如《易经》中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左传》中的“虽鞭之长，不及马腹”；《韩非子》中的“远水不救近火”等等。

从大的方面讲，谚语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对于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基本上有所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赛信鸽的育种、训养、竞翔等整个过程都可以从谚语中或多或少地得到启迪。

如“东北风、雨祖宗”“鱼鳞天，不雨也风颠”“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等，不胜枚举。当然，究竟能得到多少启迪，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何况谚语中还有一些和赛鸽有一定关系的。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它暗含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

不少赛鸽家科学地运用这一原理训练赛鸽，尤其应用于赛鸽在短、中程比赛中快速归巢、快速进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类似这样的谚语还有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一窝在，百窝在”，这是讲生物界的遗传规律的，等等。特别是有些谚语直接相关于赛鸽的。谚语云：“七零、八落、九齐、十美。”它告诫我们，如果指望那些从每年7月至10月正处于“七零八落”，特别是换毛高峰期的赛鸽参赛拿奖，那么到头来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那些“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不归鸽中，许多正是处在这个关键时期。可见，要在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过好换毛“鬼门关”，确实是赛鸽家们头痛的大问题。谚语有“雨过天晴，放鸽最灵”。好多比赛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取得高归巢率、高分速的好成绩。印象最深的典型例子如1998年哈尔滨市春赛，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千公里比赛，放飞3000羽，当天归巢65羽，取得如此的好成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天气条件。

我国幅员辽阔，经纬度跨度大，气候差异较大，地貌丰富多变，各地的赛鸽运动十分

活跃：短程赛、中程赛、长程赛和超长程赛并举，单关赛和多关赛结合，地区间既有联赛又有对抗赛，且在探索翻山越海、尝试特殊季节和气候的比赛等。因此，相应产生了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化的谚语。

安徽鸽谚云：“一环套一环，环环要分清。要是缺一环，放路归巢难。”此鸽谚认为：一羽好鸽应具备鸽眼中的“环”，如瞳孔、浅圈、内扣线、外扣线、外卦沙等，且要完美无缺。“头巢蛋，终生伴”则以为鸽子最留恋的是其从幼鸽长成成鸽的地方，尤其是其产第一窝蛋的地方，它可能终生不离。还有如“鸽子放远近，瞳孔大小论”等。

苏南流传的鸽谚有：“早晨放飞，当天千里。中午放飞，参差不齐。雨天放飞，鸽赛大忌。傍晚放飞，胜关笼里。”

重庆有鸽谚曰：“头巢蛋，金不换。出笼蛋，不上算。”认为成鸽在自己孵出的幼鸽即将出巢上房时，成鸽又下的这窝蛋俗称“夹窝蛋”，是孵不出好鸽的。还有如“千蛋万蛋，不如单蛋”“要得鸽儿壮，请把独蛋上”“雄蛋两头圆，雌蛋一头尖”“一往山上放沟间，二往坝里放高山，三往旱地放水边”等。

四川鸽谚则曰：“砂翻山，水走路，有了光头才煞雾，炭底走远路”。“光头”，明亮有光的眼睛；“炭底”，黑色的眼志。此谚是说眼砂好、眼志好，就能放路。眼睛透光不怕阴天，黑色眼志能飞远程。“红夹乌，不得输”则说眼砂色素红中泛黑，归巢稳定。还有如“花砂花砂，十花九耙”“老二红、老二红，世代代不受穷”。所谓“老二红”讲的是眼砂红得发紫。“飞砂，走水”“金穿砂，金穿砂，只有头代能回家”“金配砂，头代传；再转黄，代代强”“无黄不翻山，无光不走路”“黄翻山，黑驾雾”“三分育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险”“外杂交、内杂交，养鸽办法高”“家庭富、栽桑树，家庭乐、养只鸽”“粗砂雄、细砂母，清水雄、蓝水母”等等，不一而足。

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不同，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特殊的文学。它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与愿望，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融汇了人民的艺术才能，并为人民集体所承认和保存。因此，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流传性、变异性和地域性特征。谚语属于民间文学范畴，当然也具有这些特征。所以，我们在审视这些谚语时，千万不能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而应当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视觉，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的不同

而作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在此地、此人、此种条件下适用的谚语，也许在彼地、彼人、彼种条件下却不怎么适用或完全不适用。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中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再者，经过实践检验，有些鸽谚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属无稽之谈，像“带蛋的鸽子飞得快”“十花九菜”等。

中国的赛鸽运动正呈现蒸蒸日上的态势，而民间谚语，特别是鸽谚，将会以它特有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与赛鸽运动共同丰富和发展。

· 论文推介 ·

◆《民间文献、数据库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

【作者】黄向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一、民间文献的定义与性质

民间文献的大量发现并被纳入史料与史学范畴，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所谓民间文献，一般泛指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并留存的历史文本，包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医药书、堪舆书、日用杂书等等。其中如谱牒、科仪书、唱本剧本等文类，虽较早即已进入世族史、宗教学、文学和民俗学等研究领域或学科范畴，但对于总体上何谓民间文献，学界尚无明确一致的定义。

民间文献具有以下五个共同特征：首先是书写性，它们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书写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知识体系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上与口头传统相区别，反映的是“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统合的结果。其次是民间性，尽管并非完全与官方无关，有的甚至是官方介入的结果，如碑铭、诉讼文书等，但它们产生、使用和传承的场合或领域、使用者及其群体的目的以及所具有的功能和反映的意志大体是非官方的。其三是地方性或地域性，它们应对的事务、涉及的人际关系、使用的语言、因循的习俗以及文类的格式及其流通范

围等，都属于地方或地域社会的范畴。其四是实践性，它们不是单纯的文人创作活动的文本，而是民众书写实践的产物，是嵌入于权力关系、组织行为以及个体和群体的社会能动性的一部分，既体现了客观历史过程与制度、话语、观念的互动，也包含口头与书写之间的互动。其五是日常性与民俗性，它们都是因日常生活的惯例和处理各种事务的需要而形成的，因此是宏观历史过程在民间社会所展开的“细节”和“实态”，并在约定俗成中成为地方共享的习俗。概言之，民间文献既是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对文字的实用性、工具性的运用，同时也是构成大众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结构的一种文字形态。

二、民间文献数据库与社会理论及田野研究的关系

在数字化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下，为民间文献建立数据库，并以之为基础开展数字人文的应用和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普遍共识。然而，即便是数据库与数字人文有更成熟的发展，它们不但不能取代传统上研究者对人文世界的体认以及对社会思想、社会理论的探索，更不能抛弃田野研究或者把“跑田野”简化成“拿资料”，反而更加突显这两方面的重要性。民间文献的地方性、多样性、零散性以及不同文类的特殊性，往往被认为易于使研究流于“碎片化”，而数字人文工具在大量零碎资料之间发现或建立各种关联的优势，可以有助于避免这一问题。不过，数字人文工具的开发和利用，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文研究的。从民间文献中提炼出何种具有历史深度、人文价值和社会理论潜质的议题，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人文素养、学术敏锐和理论检视和反思、创新的能力。

民间文献的“在地性”决定了研究者要做的既是“在文献中做田野”，同时也是“在田野中读文献”的工作。其理由有四：一、民间文献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特定“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构成总体的“田野”的一部分；它们也不只是有“内容”的“史料”，本身还是作为“物”的形式和象征，其创造、书写的事件性、空间呈现方式、“用”、“看”和“读”的人和场所等等，都是嵌于文献内外的重要信息。二、民间文献只在特定人群及其社会脉络中传达特定的意义，研究者只有在这个脉络中才能读懂它们，因为它们既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工具理性”的表现，也受到多种“集体无意识”结构的制约。三、民间文献的形成，本质上是具体生活场景中人的活动的产物，因而也是其社会网络缔结过程的组成部分。四、民间文献与其他历史文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田野中看到这些

文献的生产、使用、传承的过程。

目前,以民间文献数据库、社会理论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所产生的具体研究成果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郑振满、丁荷生对莆田平原开展的区域史研究。

三、民间文献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莆田平原的研究,可以说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普遍兴起的“总体史”追求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它无疑只是“总体史”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最不易复制的一种模式。“总体史”(total history)这一概念,由二十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费弗尔提出。随着该学派的迭代更新,微观史、心态史、新文化史等取向逐渐取代了“总体史”,由历史过程的史实上的总体,转向了关系视角和方法上的总体。与此同时,在对年鉴学派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源自功能主义的整体论也受到了挑战,但整体观至今仍是人类学最基本的方法论之一,并经萨林斯等人的提倡,一种本体论上的整体以及关系主义的整体,已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史学界对“总体史”的关注,固然受到了八十年代以来引入的年鉴学派学说的影响,也离不开史学整体上社会科学化的大背景。不过,由于中国学术自身的特殊传统,当代史学强调的“总体”,并不囿于年鉴学派的理路,而是具有更宏观的学科转向的意义,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涵:首先,是历史实践的总体。在延续“新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在王朝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和帝王将相的历史之外,补充了民间社会和普通大众的历史,在学术上实现“人民创造历史”。其次,是社会体系的总体,即把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纳入更具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其三,是时空脉络的总体。从截取不同时空中的史料来连缀通史的某些片段,转变为区域史的整体视角,聚焦于一定空间维度内各历史要素的有机关联,关注时间流程以特定社会空间为依托的情境化展开方式,从探寻相对微观的“局部的总体”来把握宏观历史的向量。其四,是关系的总体。从人的主观间性与参与客观历史实践的过程本身出发,注重从关系和网络的角度探寻个人生活史、村落生命史、事件史、制度史乃至全球史的连接,通过把各种文献作为网络的节点和传达特定意义的符码,批判性地重建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多重解释,以揭示历史中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本质。

我们可以发现在借助数据库与数字人文工具，并结合深入的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一方面，国家通过文字及其文牍系统渗入基层社会，从而达到政治上的“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同”；另一方面，民间则习得和运用文字来应对社会生活所需及处理地方公共事务，并吸纳或“挪用”文字蕴涵的价值、权力与象征来建构和传承其日常生活的意义体系，从而最终在维系地方社会的内在秩序和创造地方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达成了多元性、流动性与国家大一统格局的辩证统一。而这一点，正是“总体史”之于中国史研究的要义之一。

【刊载】《光明日报》2020年2月17日14版

◆《古代小说经典的民间重构——清代车王府鼓词〈西游记〉论略》

【作者】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清代蒙古车王府所藏曲本《西游记》，是以小说名著《西游记》为蓝本进行编创而形成的一部长篇鼓词。它基本上是按小说提供的故事情节与叙事脉络进行演说的，但并非照本宣科，而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与创新。其改编与创新的基本原则是世俗化、生活化、趣味化，即尽量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世界，编创一些老百姓感兴趣的世俗生活故事，并将主要人物塑造成关心民生疾苦、为民排忧解难、铲除人间不平的平民英雄，以寄托老百姓对英雄人物的心理期待；与此同时，为了使所讲的故事符合老百姓的审美口味，鼓词还设法增强情节冲突的戏剧性，增加一些笑料，刻意渲染打斗场面，讲说令人惊悚的鬼怪故事，以取得惊奇、刺激、有趣的接受效果。对此，只有从鼓词说唱与接受的角度，才能较确切地认识鼓词《西游记》的编创特点，对之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引言

古代小说名著《西游记》是在民间说唱基础上产生的，它问世后不久又进入民间说唱领域，成为民间艺人争相改编、演说的对象。以“鼓词”这种艺术形式演说《西游记》的，也不在少数。如收藏在清代北京蒙古“车王府曲本中的《西游记》，就是以小说《西游记》为蓝本进行改编而形成的一部长篇鼓词。据专家鉴定，车王府曲本多半产生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鼓词《西游记》恐怕也不例外。它也许还在街头说唱过，如曲本第四十一节中说书人就这样自嘲：“受用惯了的人，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万没了法子咧，自（只）

好是在当街上摆档子说书。”鼓词《西游记》比小说多了30万字。1955年，罗杨、沈彭年参照小说原著，对该鼓词进行了整理、修订，删除了说书人添加的所有情节，取名《说唱西游记》。经此修订，鼓词《西游记》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笔者现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车王府曲本《西游记》为据，对鼓词改编小说原著的情况略作考察。

二、鼓词《西游记》与小说原著的关系

从鼓词《西游记》曲本中频繁出现“时才话表”或“昨朝话表”等现场说书套语可看出它很可能是随听随记的听录本。从笔迹上看，听录者至少有三四人。不过，听录之人的文字水平都很有有限，简直是别字连篇。这大概是现场速记时对笔画多的字就用笔画少的代替、对不会写的字则用别字来代替的结果。

鼓词《西游记》虽是艺人说唱的记录本，但它又基本上是以小说《西游记》为底本改编而成的。如曲本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提示语：“抄录《通俗西游记全传》，请调墨书”（西游记二）；“抄录通俗多剪断，墨出不比古儿词”（西游记三）。其所谓的“抄录”，是指照搬小说原著进行演说，因为曲本中并不存在直接抄录小说文字的情况。其所谓的“墨书”，又叫“墨刻儿”。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曾解释说：“书局里的书，都是笔墨写出原稿刻板印行的，故叫那些书为墨刻儿。”“古儿词”，大概是指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因为没有文本依据，往往随意变化。故而，“按着官板《西游记》”来演说的鼓词艺人，才声称“墨书不比古儿词”，因为“墨书”是有文字依据的，并非信口编造。不过，鼓词《西游记》虽然从小说中获取了叙事框架与主要情节内容，但还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不少推陈出新的艺术改编。

三、鼓词《西游记》对小说的改编

鼓词艺人对小说《西游记》的改编，基本上是本着世俗化、生活化的原则进行的。首先，鼓词最擅长的就是抓住小说原著粗笔勾勒的世俗生活故事进行大量的增衍与描绘。例如，“刘全进瓜”，与唐僧取经关系不大，所以小说只是寥寥几笔。可是，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戏曲、宝卷等均常搬演，民众喜闻乐道，鼓词艺人投之所好，对小说原著中语焉不详的人物性格、矛盾冲突、情绪反应、场景氛围等皆做了绘声绘色的演绎，贴近了百姓的生活与情感，听起来津津有味。其次，鼓词也很喜欢在老故事中加入新成分，以此

增强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冲突，造成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如在唐僧出世故事中增入了忠奸斗争的内容，增强戏剧性。再次，鼓词还善于把一些风俗民情融入到故事情节的描写中，以增强其生活气息与地域文化色彩。例如，抛绣球择婿、比武招亲等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鼓词艺人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或在小说原著粗陈梗概的基础上详加敷衍，如第四十二节敷衍的陈员外女儿陈玉华与结义姐妹郑萃华、闻月华设擂台比武招亲的故事。饶有意味的是，鼓词艺人在演说比武招亲时，还故意使用了这样一些江湖市语：“内中有江湖之中吊（掉）市语，这人眼望那人云。叫声盆子你看看，包管（袍果）长的似昭君。若得与他捏个伴，旧（就）便是愧了飘尔也愿情。”这一般人听了可能莫名其妙。说书人解释道：“众公，说话不明，如磨昏镜；道字不真，似钝剑杀人肉中。懂得市语的君子一笑尔爽神，若要不知道的岂不令人发闷？盆子是朋友，袍果是小女孩，捏伴是成亲，愧了飘尔是要了脑代（袋）。”如此在原著所写故事的空白处穿插、演说风俗民情、江湖市语，无疑能使故事充满世俗生活情趣。

不仅如此，鼓词艺人还喜欢使用一些“小刀子哄孩子，不是玩的”；“大夫摇头，没了脉咧”的俚语俗话，经常在故事情节、人物对话、细节描写中加入一些笑料，以增添其趣味。

四、鼓词《西游记》的艺术创新

不过，鼓词《西游记》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说书人编创的一些新故事，诸如第二十三至二十六节说唱的恶霸张雄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案，第三十一节说唱的白蛇精迷惑渔夫案，等等。这些公案故事纯属脱离原著、节外生枝的部分。所以，当年罗扬、沈彭年将这些故事删得一干二净。可是，从民间受众的角度来看，这些故事才真正贴近了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疾苦与喜怒哀乐，寄托了他们的美好愿望，符合了他们的审美口味。其中恶霸张雄的故事说的是，汪国祥做生意折本，因租赁恶人张雄房子，交不起租金，被张雄差狠仆时常打上门来，不得已搬入张雄荒弃的废园之中。其妻郭氏游园，撞见女鬼诉说被张雄所害的怨苦，遂中邪变疯。孙悟空通过郭氏和一书童得知张雄放债坑人、勾结官府、欺男霸女、打杀民女等罪行，于是巧设计谋，审断冤案，救善惩恶。

这个故事集中地反映了世俗社会常见的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巧取豪夺、鱼肉乡民、

无法无天等罪恶现象，表达了老百姓有冤难诉、有恨难伸的满腔义愤。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然热切盼望有孙悟空这样本领高强的游侠出面为他们抱打不平，申冤吐气。如鼓词中就反复唱道：“孙悟空惦记女鬼冤枉事，要打人间抱不平”；“恶张雄因为聒噪贞节妇，遇见猴王抱不平”……于是乎，孙悟空不再仅仅是唐僧取经的保护神，同时也是为老百姓伸冤理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法官。他的身上集中寄托了平民百姓关于清官、侠客与救世主的梦想。因此，这样的孙悟空，无疑会更受平民百姓的喜爱与崇拜。耐人寻味的是，鼓词艺人编创的艾二妞故事、孟洪故事，还是以回回教中人作为主角的。历史上，特别是清朝，京城确有大量的回民。可见，鼓词艺人说唱回民故事，当是使鼓词艺术更“接地气”的自觉追求。

另外，鼓词艺人渲染打斗场面，讲鬼故事以吓唬人等，都不外乎是为了迎合民间俗众寻求感官刺激的心理，以期招徕更多的听众。

五、鼓词《西游记》的编创特点及其评价

由上可知，鼓词虽以小说提供的故事情节与叙事脉络为基础，但它并不照本宣科，而是以世俗化、生活化的原则进行改编与创新，尽量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世界，编创一些老百姓感兴趣的世俗生活故事，并将主要人物塑造成关心民生疾苦、为民排忧解难、铲除人间不平的平民英雄，以寄托老百姓对英雄人物的心理期待；与此同时，为了使所讲的故事娓娓动听，鼓词还设法增强情节冲突的戏剧性，增加一些笑料，刻意渲染打斗场面，讲说令人惊悚的鬼怪故事，以取得惊奇、刺激、有趣的接受效果。

若把鼓词《西游记》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其艺术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从鼓词说唱与接受的角度，才能较确切地认识鼓词《西游记》的编创特点，对之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来，鼓词是一种面向听众的说唱艺术，以讲故事娱众为本位。因此，艺人在说唱《西游记》这样一部为人熟知的小说时，必须首先考虑如何推陈出新、扣人心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其所说的故事“接地气”。另外，鼓词《西游记》中存在的程式化、套路化现象，这也是由口头文学创作的特点决定的。而在实际的说书场中，由于艺人说学逗唱兼施，声情姿容并茂，听众便不会有雷同乏味的厌烦感。何况对听众来说，听书难免迟到早退，也不大可能每场必听，因此为了让听众及时了解故事进展，说书人也需要不时

重述前面所说的内容。而从鼓词说唱的刘全进瓜、唐僧出世等故事，也常见于清代的一些戏曲、宝卷、道情等作品，在内容上都大同小异。这说明在俗文学生态场域中，各种说唱文艺之间，说唱与小说、戏曲之间存在着互动交流现象，并体现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编创经验，即追求故事的世俗化、传奇化与趣味化等。

而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看，由于鼓词艺人能自觉地根据听众的接受心理与欣赏口味来重构小说原著，有意地在当地听众的视域、经验、欲求、趣味的基础上来塑造人物、创编故事、展开叙事，并积极地与听众进行对话、交流与互动，因而就更易于耸动听闻，引人入胜，产生激荡人心的接受效果。可以说，《西游记》等名著之所以家喻户晓，这与说书艺人善于从民间受众的视角重构、说唱小说是密不可分的。

【刊载】《学术研究》2016年第4期

◆《节日传说、民间信仰与地方史的互动研究——以绕三灵传说为研究中心》

【作者】张翠霞（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摘要】绕三灵传说在大理地区广为流传，口头传说与民间信仰彼此粘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节日传说在外来佛教本土化过程中被借用，后又被叠合嫁接到南诏地方王权的传说叙事体系中，成为目前流传最广的解释绕三灵节日起源及南诏王权来源的基本版本。绕三灵传说不仅是一个民间文学“文本”，更是一个社会史“文本”。它不仅承载着白族民众深层的自然崇拜与农耕信仰，而且在与民间信仰的广泛互动中，为佛教本土化传播提供了一个粘附性支点，并在与南诏、大理国政治王权的博弈中成为民众历史叙事的“地方性话语”。

近年来，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开始重新审视传说并赋予其作为历史记忆的研究价值。学界对于这一有关口头叙事传统与民众历史记忆问题的研究取向，主要源于后现代思潮给民间文学和历史学研究两个研究领域带来的研究范式转换。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传说研究由传统“文本”（text）研究转向“语境”（context）研究，或者说是民众“生活世界”（lifeworld）研究。在历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以福柯为代表的“知识考古学”打破了传统文字“信史”的客观真实幻象，对包括文字“信

史”在内的史料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所谓的历史客观性和历史真实性只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本文主要关注绕三灵节日传说与民间信仰、地方史的互动关系。

一、从信仰到传说：绕三灵传说的信仰神圣叙事

民间信仰是民间传说神圣叙事的内核。然而,从信仰到传说的过程十分漫长,其中,民间信仰世俗化是导致神圣信仰走向世俗传说的根本原因。大理白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和农耕信仰是绕三灵传说叙事的信仰内核。首先,绕三灵传说是白族先民古老自然崇拜的神圣叙事。其次,绕三灵传说包含深厚的农耕信仰文化因子。大理洱海流域农耕文化也十分深厚发达。在传统农耕社会,男耕女织是一种常态的社会分工。其间,桑蚕养殖对传统农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且桑树在民间信仰中被赋予“神木”的地位。此外,绕三灵节期在春末农历四月底,此时正是大理坝子准备移秧插种的时节。雨水丰沛于稻作耕种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在插秧前夕举办的绕三灵节日,其为稻作生长“祀神祈雨”的传说便显得易于理解。总之,民间信仰通过人格化的叙述和表达,实现了神圣信仰向世俗传说的转变。

二、从传说到信仰：绕三灵传说的佛教粘附叙事

绕三灵传说由本土传说向佛教传说演变的历程就是在丰富的社会情境中推进的,传说的发展演变是外来佛教本土化的一个明证。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经由中原、西藏和印度分别传入大理洱海地区,并由此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一方面,佛教运用自身优势结合中原儒家思想,以观音幻化“君权佛授”的传说溯源统治阶层之神圣出身,以神权巩固王权,由此获得了上层统治者的支持而渐呈兴盛之势。另一方面,佛教不断向世俗化和大众化发展,不断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值得关注的是,在佛教地方化发展历程中,一些佛教精英结合大理洱海区域广为流传的传说故事,通过人物附加、情节粘附等手段改编和创造了“观音开辟大理坝”“观音选王点化细奴逻”“观音负石阻兵”等大量本土化的佛教传说,并借此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和推动了外来佛教信仰及佛教文化在大理地区的影响和传播。由此,洱海地区的佛教信仰开始兴盛。在口头传说承载并推动佛教信仰本土化历程中,外来佛教与本土信仰及其口头传说广泛互动,通过多维文化主体,即地方上层统治者、佛教文化精英、本土普通民众等的行为实践不断发展,在借用与

粘附、妥协与融合中，使得绕三灵传说得以成为承载并融合自然崇拜、农耕信仰、本主崇拜、佛教信仰等多元民间信仰的口头叙事载体；同时，外来佛教信仰在其本土化过程中，通过人为的、能动性地粘附、借用、改编、创造，使得流传广泛、社会影响力大的传说为其所用，不仅以“新传说”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还确立了其在南诏大理国政权统治中的正统地位。当然，这样的能动性实践，反过来也会推动并扩大“新传说”的进一步传播。随着佛教本土化和地方化历程，新的口头传说势必会借助佛教的影响和播布在民间广为流传。

三、在传说和历史之间：绕三灵传说的政治王权叙事

文字记载、口头传说、仪式实践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记忆系统。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细奴逻始代张乐进求”的史实是文字记载与传说讲述的核心事件，然而在口头传说讲述中，所谓的政治之“王”细奴逻备受传说叙事的批判和鄙夷，他不仅相貌丑陋不堪，而且还以不符合社会道德的姻亲关系的缔结最终获得王权。同时，由于“金姑驸马”传说口头叙事与仪式身体叙事互为支撑，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绕三灵节日叙事及实践系统，因而“金姑驸马”传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成为解释绕三灵节日起源的基本版本并广为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民间社会记忆历史、阐释重大历史事件的张力。大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产生了特殊且多元的民间信仰与历史记忆。以上论及的绕三灵传说，内容分歧迥异，看似分属不同的传说类型。然而，究其“分歧”根本，两个传说类型，有可能都与政治权利话语参与设计相关。如前所述，“建国皇帝”段宗榜的传说，权力楔入的政治设计色彩十分明显，“本主传说作为一种攀附资本，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建构了一套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制度；“金姑驸马”传说，尽管表面上似乎难寻王权设计的痕迹，但是深究之，如果没有“一套政治王权参与设计的普及于民间的社会机制”，那么试问“接送金姑驸马”这样一个长达三月之久，跨地域、跨民族的节日仪式实践及民族文化交流系统如何能在大理地区代代传承？其间，一只无形的“政治之手”一直影响和制约着绕三灵王权叙事的发展、演变和流。

总之，作为文化传统的传说，是不同历史时代“层累叠写”的结果。从历时来看，传

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时间链上是具有连续性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传承与变迁的节点已然难以分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传说发展历程中，每个时代均会在传说上打下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烙印”。这种“时代烙印”和“历史印记”，以极为隐秘的文化符号印刻在传说“文本”上，在民众选择性地遗忘、借用、粘附、嫁接、创造与改编中，实现传说的传承和发展，并反过来成为社会时代变迁的明证。

【刊载】《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众志成城，共同战“疫”——各地民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综述（三）

“抗击疫情有担当，救死扶伤保四方，天使守护莫相忘，中华医德美——名——扬！”就如辽宁的对口数来宝抗疫主题作品《冒名顶替》所唱，辽宁、内蒙古、山东、广西、广东、河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发挥专业特长，满怀热情、积极创作，以丰富多样的文艺形式记录这场抗疫阻击战中值得铭记的点点滴滴。

这些文艺作品中不仅有独具慧心的个体创作，也有珠联玉映的合作作品。铁岭市曲协主席赵秀、副主席张春丰和理事郑可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曲《辽 M 小娟》，以浓郁的辽北艺术风格，表达了对家乡支援武汉医疗队员及所有奋战在一线逆行天使的深情歌颂和赞美；以家人的深切告白，再现了医护人员在疫情中的艰苦奉献和牺牲。以铁岭市民协副主席、市剪纸艺委会主任张欣为代表的 11 名铁岭剪纸人，接到辽宁省曲协秘书长刘蕾为歌曲配图的倡议后，放弃清明假日休息，起稿、打样、开剪，一气呵成演绎完美合作。铁岭文艺人强强联手，用一首朴实的歌，用地道的民间剪纸图画，把老百姓内心真情实感淋漓尽致

地表达出来了。

民间文艺工作者善于抓住特殊节点和地域特色进行创作，如结合三八妇女节，关注抗疫过程中的女性力量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品《2020“三八节”写给武汉胞妹》，以及内蒙古包头的《战疫情，有我们巾帼英雄》。在内蒙古包头要红霞的《立马迎风》和王红川的《跨马驱疫》剪纸作品中，还可以看到“马”这一纹样所体现的具有草原生活气息的神韵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抗疫创作中涌现的新生力量，如内蒙古赤峰《抗病毒小常识》的作者房晓敏（11岁），内蒙古包头《生命之树》的作者马安遥（6岁），陕西布堆画作品《佑护生命》的作者樊子艺（9岁）以及广西南宁《武汉加油》的作者陈艺丹（13岁）等。从他们稚拙却真诚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民间文艺薪火相传的希望。

（根据各地民协战“疫”主题创作的系列报道综编）

河南开封将清明文化节搬上“云”端

由中国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民协主办，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网信办、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民协和中共开封市委、开封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0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于4月1日至4月10日举办，为期10天。

2020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以“传承文明、拥抱春天”为主题，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砥砺前行、慎终追远为主旨，进一步突出活动的文化性、群众性、创新性、连续性和独特性，持续打造中国清明文化时代品牌。2020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以“节俭、务实、精彩、安全”为基本原则，在亿万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汇聚起抗击疫情磅礴力量的背景下，落实中央网信办关于在传统节日期间深入开展“网络中国节”系列网络文化活动的的基本要求，探索利用现代网络平台举办文化节会，增强文化节会在网络新媒体上的即时性、广泛性和互动性；以大数据“云”来承载，以网上节会的形式进行“云”传播、“云”呈现，讲好开封故事，树立开封形象，弘扬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

响。

“云”推清明特别节目。探索传统文化新的“打开方式”，挥去春寒尽清明——2020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特别节目于4月3日推送上线。在举国上下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让洋溢着时代风采的诗词和歌曲通过“云”端，体现大美开封文化的魅力和战“疫”风采。特别节目由《序幕：千年花开》《第一篇章：宋词情思》《第二篇章：清明文华》《第三篇章：江河壮歌》《尾声：庚子催春》5个部分组成。“序幕”以开封博物馆复原的北宋水运仪象台的报时画面开启清明文化节的帷幕；“第一篇章”以一阕阙歌咏春天和清明的宋词致敬时代；“第二篇章”以《清园踏歌》《清明到开封读诗》《开封胡同》《穿行在开封的街巷》等诗词和歌曲为载体，呈现清明文化在开封传承、发展、弘扬的脉络；“第三篇章”以《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信仰春天》等诗歌，唱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疫英雄之歌，体现出开封精神、黄河精神和开封人民的家国情怀；“尾声”以歌曲《天耀中华》讴歌阴霾散去的春天，展现阳光清明、天地清明、盛世清明的盛世景象。

“云”上“云”下活动融合互动。系列文化活动以线上活动为主，“最美宋装照——穿越清明”“相约春天——线上结缘”“开封四月最清明——全民读诗喊红包”，《开封市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作品邀请展》，《精忠报国岳家军》等视频短剧，抖音网课《宋代清明的茶叶盛世》等丰富多彩的网上系列活动，让受众耳目一新。节会期间，《“源·流”——极目长河（董保华黄河主题摄影展）、宣和撷影（宋代书画复制展）、都会拾珍（开封市政协书画院、开封美术馆收藏名作展）系列联展、“国际灯展 赏灯清明”“国际郁金香艺术节”“大宋花朝节”“北宋开封府清明颁新火大典”等线下活动，也在“云”中精彩展现。

“云”台招商签约。招商活动是清明文化节的重头戏，今年清明文化节期间的招商活动将采取线上+线下签约的形式进行。截至目前，全市已征集拟签约项目66个，总投资425.45亿元。这些项目的签约通过网络进行呈现。

“云”促文旅复苏。以清明文化节为契机，开封加大推介和文旅宣传，复苏旅游经济。以全市18家A级景区的名义，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实行全年免门票参观。制定发布企业复

苏发展的 17 条扶持措施，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实施政府贴息支持、落实兑现奖励政策等 17 条具体措施促进文旅企业恢复性发展。制定文旅企业开复工工作指南，城墙本体（东城墙）修缮项目等一批重大文旅项目已陆续复工复产。龙亭公园、清明上河园等全市景区已恢复开园营业。开封将以清明文化节为引擎动力，加速文旅产业恢复性增长，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云”中缅怀追思。慎终追远、缅怀先人是清明节传承不绝、延续至今的重要文化内涵。通过网络平台祭奠追思革命先烈，祭奠追思焦裕禄等时代榜样，祭奠追思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牺牲的医务人员和一线防疫工作者，是本届清明文化节上一项重要内容。参与者可在网上为先人们献上鲜花、点亮蜡烛、留下感言，既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生者的抚慰和对生命的敬畏。

（转自微信公众号：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 国际信息 ·

◆ 澳洲民众线上“云”游中国世遗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制作的“人类的瑰宝——世界遗产在中国”线上展于 4 月 17 日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官网正式推出。这是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持续策划、打造的“云·游中国”系列线上展览之一。

“人类的瑰宝——世界遗产在中国”线上展共展出中国 55 处弥足珍贵的世界遗产。无论是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还是新晋的世界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鼓浪屿、良渚古城遗址，人们都可以通过展览尽情享受一场视觉的盛宴，品味它们的历史，阅读它们的故事，体悟它们的精神，更能由此触摸中国世界遗产身后沉积的五千年悠长历史，感知厚重精深的中华文化，增进对中国遗产保护的了解。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裹缠了人们的双脚，但却挡不住人们对“诗和远方”的向往。由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云·游中国”系列活动正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脸书、推特、影格、优兔等社交媒体上陆续推出。澳大利亚民众将通过这些网络“云”平台，畅游中国美丽山河，感知中国文化魅力。期待疫情过后，再到中国亲身体会“超乎你的想象”的美丽中国之旅。

（来源：中国文化中心，辑录：陈婷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征集 COVID-19 流行背景下的活态遗产经验

4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上刊出新闻，征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背景下的活态遗产经验，并号召大家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大流行使得全球范围内目前正经历着非常严重的封锁状态，这场危机并不仅仅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节日和文化活动被取消或推迟，文化习俗和仪式受到限制，给许多人的生活造成困扰。

与此同时，UNESCO 也看到活态经验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怎样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UNESCO 希望这些故事将有助于加强我们在 COVID-19 的情形下学习如何保护现存遗产，并激励社区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UNESCO 鼓励人们将自己的经验通过线上表格发送给他们（表格分英、法、西三种语言，表格可通过下方“来源”链接找到）。参与者可以收集疫情期间自己所在组织或者其他感兴趣的与活态遗产有关的故事。

（来源：UNESCO 官网 [https :](https://ich.unesco.org/en/news/living-heritage-experiences-in-the-context-of-the-covid-19-pandemic-13261)

[//ich.unesco.org/en/news/living-heritage-experiences-in-the-context-of-the-covid-19-pandemic-13261](https://ich.unesco.org/en/news/living-heritage-experiences-in-the-context-of-the-covid-19-pandemic-13261) , 翻译：陈婷婷）